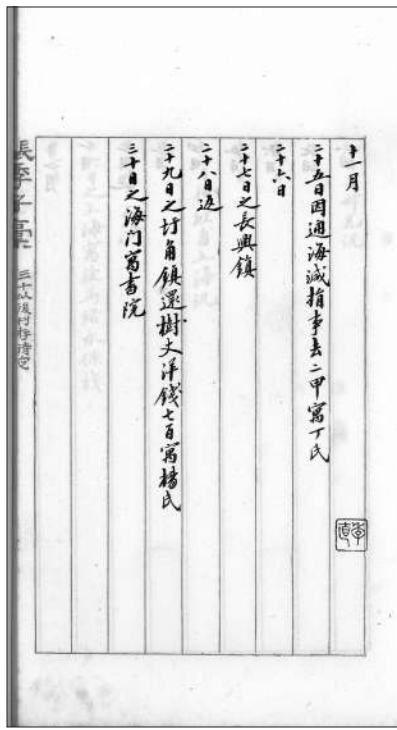


# 《张謇日记》出版始末

倪怡中



一九六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



一九六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内页

习近平总书记江苏考察调研时参观南通博物苑,对张謇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成就作了很高评价。张謇逝世以后,他儿子张孝若1930年9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31年10月又在该书局出版了《张季子九录》。但这两部书都不包括“张謇日记”。直到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謇日记》(影印本)，“张謇日记”才得以公之于世。

## 手稿后半部回故里

“张謇日记”手稿始于1873年,张謇20岁;终于1926年,张謇去世,共28册。其中第十册(31岁至32岁,由1883年至1884年),第十五册至二十八册(40岁至74岁,由1892年至1926年),这15册“张謇日记”手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辗转,保藏于南通,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謇日记》就是据此为底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大生公司董事长王象五(后为南通市政协委员)在上海向张謇长孙张融武借“张謇日记”手稿15册(即现藏南通的15册)阅读。因张融武滞留香港,王象五无法归还,将手稿带到南通,交给时任南通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王敏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王敏之从事地下工作,曾以张家亲戚身份为掩护借住在张家,因此对张謇的历史非常熟悉,他认为“张謇日记”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应好好保存,便将手稿交给市委征集史料办公室副主任穆烜保管。穆烜从事地方文史工作,深感保护文献的责任,“张謇日记”手稿是稀见文献,史料价值难以估量,但保管不易,最好的办法是出版出来化身千万,也能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使用。于是他征得王敏之同意,向市委写了申请报告,经市委批准,该手稿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穆烜送手稿到南京,为将手稿安全送到出版社,他专门请木匠量书定做了一个小木匣,装了搭锁,把手稿锁在木匣内,出门坐船乘车住招待所,到出版社制版,人和木匣形影不离,晚上睡觉也放在枕头边。《张謇日记》出版后,原手稿如何处理?经南通市委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仍归还张謇后人保管。当时在南通的张謇孙女张秉武表示,只要给她几套书,供其自己看及送人,手稿还是给图书馆保管好。于是,这批张謇日记手稿15册入藏南通市图书馆。

想不到张秉武的这一决定挽救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命运。几年后,“文革”爆发,张秉武家所有图书字画悉数被拉走,一把火烧得片纸不留。直

到许多年后,张秉武仍庆幸地说:“还好把书送给了图书馆,要不早就烧成灰了。”

## 手稿前半部在香港

《张謇日记》的出版,在香港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就是沈燕谋。沈燕谋是张謇之友沈敬夫长孙,是张謇赏识的青年才俊。张謇《致沈敬夫旧膝跋》云:“……燕谋为敬夫长孙。方余与敬夫计厂事时,暨批之发,裁出案上耳。自游美习理化学归,余任以事,而敬夫前逝,不及见其成立矣,可胜慨哉!”张謇感沈家恩德,出资供沈燕谋赴美留学,1916年他回国时26岁,张謇聘他在大生纱厂任职,兼纺织专门学校教授。张謇认为沈燕谋中西文基础好,有办事能力,是可以继任事业的后起之秀。张謇曾对他儿子张孝若说:“燕谋憨直的习性像他祖父,而他忠实的美德也像他祖父。我很希望他扶助你,也像我和他祖父。”(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赞誉,期许之情溢于言表。沈燕谋40年代寓居香港,对大陆和南通,特别是张家的情况十分关注。

1965年沈燕谋已年逾古稀,听到友人告诉,有人从大陆带来一部《张謇日记》,仍很激动,“喜甚,询以能否借阅?”当他知道《天文台报》有报道,立即嘱儿子到报摊寻购,买到两天的报纸,看到有署名“若韩”的连载文章片段,记有啬公(张謇)督教孝若,啬公筵席间谈及河工事,言天下无一劳永逸之事,只有永劳,或有一逸等文字。沈燕谋认为这些记载“皆为事实而有余所习闻者”,“而其出或出于日记之外,未可知也”,因此,亟待看到原书。他写信向同在香港的张融武询问,张融武复信说,日记之前半部现在他处保存,大陆影印出版的是后半部,是他妹妹保管的,至于出版的具体情况他也不知。他又去函说,后半部已影印,何不将你保管的前半部也在香港出版,合成完整,俾“治史者亦得从著者自叙明其一生治学经历,与其事业发展之源流”。

不过月逾,张融武信来,说《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到了,约沈燕谋来家中看书。过了两天,张融武夫妇又亲自送张謇日记原稿上半部13册到沈燕谋儿子沈孟平家。沈燕谋终于看到了他一直想看到的“张謇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张謇日

记》影印本,“书之广袤划一,自书而形式原文,所有文字不论逐日所记、备忘留字或诗文书稿,只字不遗,而覆以统一表面,题名曰《张謇日记》,用机械纸略似毛边者,稍失厚重,其册数亦仍旧,封面上端右角数字不改,首第七册(应为第十册),次第十五至二十八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胶版纸本一千部,宣纸本五十部”;手稿十四册(应为13册),则“有纸大小不齐,日记字迹或极工整,或草率至不可辨,杂以诗词文稿之属……就稿读之,殆非有根底者不能胜清缮之任……非有校勘工夫不能读也”。

沈燕谋原以为依原手稿影印即可,结果“试印四叶,皆不佳”,这让他感到“以迄今日印刷设备而论,恐难与大陆已成景印之书全似也”。

## 台湾出版《柳西草堂日记》

沈燕谋在左舜生(曾和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作为国民政府参议员访问延安,后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9年定居香港,曾任教新亚书院)那儿知道了沈云龙这个人,后来看到沈云龙编辑的《近代学人丛刊》《边疆丛书》《袁世凯史料丛刊》等书,沈燕谋认定,让这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颇丰,辑印人物评传、史料丛刊、从编达数百种的历史学家出版《张謇日记》不会错。

1967年8月3日,沈燕谋从香港启程赴台湾,其时,他已77周岁,他此次出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出版“张謇日记”手稿。到台后两天他就不顾旅途劳顿去拜访沈云龙,洽谈日记出版事宜。

沈云龙回访时,沈燕谋取出随身带来的“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和他商量如何付梓出版。沈云龙表示,不日将和出版社编辑来面谈。隔了几日,沈云龙和台湾文海出版社李振华一起到沈燕谋处,商定出版影印的各项细节,沈燕谋将日记手稿1—5(完好)5册、6—9(有残缺)4册、11—14(完好)4册,交付给沈云龙,请他查检编序后交给李振华。不过十日,沈云龙和李振华持日记手稿来,告诉沈燕谋,已核对整理完毕,可以拓影备印,约需两周时间。果然过了半月,李振华来说,手稿拓影已完成,原件已交还沈云龙,还带来毛边和白色的印书所用纸张,请沈

燕谋选择。又过了半月,沈云龙、李振华将“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完璧归赵,并带来印好的书样4页,沈云龙还拨写了介绍“张謇日记”的文章,记叙了这次编辑出版的经过,连载于《传记文学》。

10月23日,书印好送来。沈燕谋没有看错人,沈云龙是位实干的出版家。从沈燕谋赴台到“张謇日记”手稿成书不过两个多月,煌煌4大本,影印出版,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效率也不可谓不高。沈燕谋抑制不住兴奋,在日记中记:“沈耘农、李振华携印成后加线装之柳西日记四巨册来,欢喜无量。为此行一大收获。”(朱少璋主编《沈燕谋日记节钞及其他》)

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出版了“张謇日记”的前半部分,并附有曹文麟(1879—1951,字勋阁,号君堂,通州四才子之一,深受张謇赏识)的《张季直先生传》和张督(1851—1939,字叔俨,号退庵,张謇三兄,襄助张謇创办各项事业的)《癸未六月日记》。自此分藏大陆、香港两地的“张謇日记”手稿相继影印出版。1969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依照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将“张謇日记”后半部14册及第10册补齐,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影印出版了全部28册的“张謇日记”。“张謇日记”在著者逝世40多年后终于出版,手稿也历经劫难保存下来,这是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 《张謇全集》的两次出版

20世纪80年代,南通张謇研究中心成立后,和南通市图书馆开始联合编辑《张謇全集》。全集以《张季子九录》为基础,增加、补充了南通市图书馆藏张謇未刊稿,未收入《张季子九录》的刊载于报刊的张謇函电、演说、呈文、启事、谈话等佚文遗著,以及张謇手账、日记、张謇为所创企业撰写的《说略》《略略》等文献共200万余字。

1994年10月,6卷7册《张謇全集》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6卷为日记、年谱,这是张謇日记第一次以排印本的形式出版。但1994年版《张謇全集》也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误植之处甚多,使学者难以直接引用”。主编单位张謇研究中心和南通市图书馆一直注意搜集学者和读者的意见,持续开展补遗和校勘工作,以俟再版时修订。

2003年4月在扬州举行的“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期间,有关专家学者提出重新编辑《张謇全集》的建议,南通市委、市政府在当年9月启动新编《张謇全集》的工程。

新编《张謇全集》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于2012年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编《张謇全集》为8册,605万字,其中第8册为张謇日记、年谱。新编《张謇全集》借鉴吸收了前人编纂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编纂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许多文稿均做了必要的考证,对以往的注释错误作了订正,从此“张謇日记”有了可供引用、阅读的准确的标点排印本。

蔡元培挽张謇联说:“以文学鸣光宣两朝,日记若在,用裨徵文考献,当不让常熟遗篇。”蔡元培推崇张謇的诗文,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清末独树一帜,而他的日记考证文献的价值可以和俞同龢的著述媲美。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张謇日记”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研究员)

## 蔡元培的“绿茶哲学”

李云贵

近代著名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蔡元培对于品茶有他的独特见解,他的绿茶哲学更是发人深思。

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时,有一位学生对成功充满着渴望和憧憬,而在生活中却屡屡碰壁,没有什么成就。于是,沮丧的他便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指点。蔡元培收到信后,约了一个时间让这位学生到办公室面谈。

学生准时赴约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蔡元培笑着招呼道:“来,快坐下,我给你泡杯茶。”说完便起身,从抽屉中拿出茶叶,放进杯子里,倒上开水,递到学生面前说:“这可是极品的绿茶,是朋友特地从南京带来的,你尝尝。”刚泡的茶叶稀疏地漂浮在杯子上,杯中水没有一点绿色。学生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喝到口中像白开水似的,没有一点茶叶的味道。他不禁眉头一皱。蔡元培先生好像没注意到学生的表情,依旧

和学生聊着天。

学生感到很很不自然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一下,他忙找了个理由准备告辞。此时,蔡元培微笑着说道:“急什么,把茶喝了再走,这可是一杯极品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学生又端起茶杯,礼节性地喝了一口。这时,只见茶叶已经沉入杯底,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色,像翡翠般灿烂夺目。过一会儿,整个办公室都充满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香气。

学生喝着蔡元培泡的绿茶,蔡元培满含深意地问道:“你明白了吗?”学生顿时恍然大悟,他惊喜地说道:“我明白了,追求成功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凡事都要静下心来,认真地踏实地沉下去。”蔡元培先生听了学生讲的话,满意地点头笑了。

## 刘半农常州创“她”

周二中

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半农发明了“她”这个字,并且还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一诗。但“她”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发明的,大多数人则茫茫然。

1916年,为了生活,刘半农和弟弟刘天华在上海黄浦江滩头漂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海漂”。当时,刘半农对文学充满热情,他任编辑,当译员,发表小说、翻译作品40多篇,小有成就。然而,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梦想,他“辛勤所得仅免于饥而不能免于寒”,最困难时,寒冬里兄弟二人仅得一件棉袍轮流穿着外出,不要说前途辉煌了,连弄饱肚子都难。

不得已,刘半农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江阴老家。当此之时,常州乡下焦溪镇(与江阴相邻)人刘润庾想办一所新文化学堂,也就是西校,以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和新知识,并且打破旧传统,吸收男女学生同校上课。刘润庾得

知刘半农赋闲在家,于是登门拜访,聘请刘半农、刘天华兄弟到焦溪镇西校讲授课程。

在焦溪镇西校教学时,刘半农发现对男生女生的称呼都是“他”,很难区分“他”是指男的还是女的。他联想自己过去在上海翻译西方作品时,英文里男女的“他”是不同的单词,但翻译成中文时都用“他”,不好分别。当时很多人也试图用不同的字来区别男女不同的他,例如鲁迅就常用“伊”来指代女性,还有人用“彼”“其”“之”来指代女性,但一直没有统一,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

刘半农想,为什么不另创一个字来加以区分呢?于是,1917年他在翻译英国戏剧《琴魂》中,便试探性地用了自己创造的新字“她”。又经过一些波折,1920年,刘半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她”字的问题》一文,深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到此时,“她”字才最终为大众所接受。

## 沈尹默的诙谐贺联

冯忠方

1935年,年已66岁的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当世名流熊希龄结识了复旦大学30多岁的女教师毛彦文女士,两人一见钟情。经过一番了解,便欣然结为伉俪。二人结婚时,身边一些至交好友特别是喜欢舞文弄墨者,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老夫少妻这个话题,并把它嵌进了送来的贺婚对联里,为他们的婚礼增添了不少谐趣。

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沈尹默的贺联,可谓亦庄亦谐:

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沟通孟子;  
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

原来,沈尹默的朋友熊希龄与毛彦文热恋时,复旦大学有位与毛女士年龄相仿的教授、红学家吴宓也在狂热地追求她。最后毛彦文还是选择了熊希龄,一时成为街谈巷

议的焦点。上联中的“舍鱼取熊”,典出《孟子·告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鱼”“熊”分别指吴宓(吴、鱼之音在苏沪一带相谐)、熊希龄。下联中的成语“吹毛求疵”,出自《韩非子·大体》,原意是把兽皮上的毛吹开,去细找其中的毛病。

这里还写出了他们热恋中的一件趣事:当时熊的胡须有一尺多长,毛彦文嫌其累赘,要求熊希龄必须剃掉蓄了多年的胡须,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熊言听计从,毫不犹豫地心爱的胡须剃得干干净净。这便是“吹毛求疵”的另一番寓意。更巧的是,新娘子又姓毛,一个“毛”字兼两事,作者此联用典与叙事融为一体,语带双关地隐嵌了“熊”“毛”之姓,幽默中有趣味,妙在其中。

## 陈毅一语道断中西小说

杨建民

著名诗人艾青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人自己与陈毅的相识情形。1941年初,应周恩来之邀,艾青与画家张仃、作家罗烽等,由重庆艰辛来到延安。由于艾青的名气,到延安后,是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宣传部长凯丰为他设宴接风。

不久,周恩来回到延安,开会学习报告之余,很关心艾青情况。一次报告结束,周恩来邀请艾青一起用餐。此时,一位壮汉正带着浓厚四川口音,大声地说着文学问题:“中国小说和外国的不同。中国小说是有头有尾,外国小说是拦腰截断。”艾青听到这高度概括的观点,很为其通俗简明折服。周恩来介绍

说,“你不认识?这是陈毅军长。”艾青与陈毅,由此结识。

陈毅早年曾留学法国,当时还想着以文学为生,读了大量西方文艺作品。回国后曾翻译过法国名诗人缪塞、拉马丁等人的作品,他自己不仅写诗,也创作过小说多篇,不是文艺外行。他对中西小说特点的论断,可视为高度概括。从中国传统小说(包括现代乃至今天的许多小说)及陈毅(包括艾青)当时接触的西方小说看,与实际较为相符。此论今天看去虽然不免笼统,可从总体说,不失为独有见解,是从大局一下抓准特征点,宏观考虑问题的认知结论。

## 贾平凹与糊汤面

程毅飞

老贾,是故乡人对贾平凹的称呼。一个“老”字,土生土长,入乡随俗。贾平凹深爱着他的故乡,他视商洛为他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地。在《我的故乡是商洛》一文中,他开篇就这样写道:“人人都说故乡好。我也这么说,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起商洛,我都是两眼放光。这不仅出自于生命的本能,更是我文学立身的全部。”他还说:“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萝卜、一个红薯,是商洛的品种,是商洛制造……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岭南坡的腔调。”正是这种乡情,才使他的口味一直停留在“洋芋糊汤的记忆”里。

出身于陕南商洛山中的贾平凹,祖祖辈辈都以务农为生,生活的艰辛使他从小就知钱财来之不易。在贾平凹眼里,两元钱不是两元钱,是白花一朵。小时候,母亲让他去买盐,两元钱要缝到衣服口袋里,到代销店后方折线掏钱。两元钱的盐,是一大家人好长时间的唯一调料。如今,贾平凹虽已是一代大家名家,但本性依旧难改,仍然不忘家当年“惜饭有饭吃,惜衣有衣穿”的家训,始终保持着先前的生活习惯和节俭美德——穿衣不挑剔,只要合身、舒服就行;吃饭不讲究,不贪吃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就爱吃家乡的糊汤面。

贾平凹喜吃清淡素雅的饭菜,与他沉静、安详、稍显木讷的神情不谋而合。他吃豆腐不要炒,喜欢用清水煮了吃;爱吃包谷面,却不爱吃一同磨下的稍稍粗的包谷糝;吃饭喜欢吃烙

馍不爱吃蒸馍,烙馍要薄不要厚;爱吃萝卜,生熟都行,生吃熟食,熟吃滋补。贾平凹很少吃肉。猪蹄,他不吃,说猪蹄有脚气;鸽子,他不吃,说太残忍;他甚至不吃味精,感觉那是骨头研磨。他还有一个怪癖,就是不吃和自己名字有关的食物,比如平菇、娃娃鱼、青蛙等,问他的回答是:“自己咋能吃自己呢?”常常惹得人哭笑不得。

在饮食中,贾平凹尤其爱吃丹凤棘花老家的糊汤面。面要一指宽的,糊汤要玉米面拌的,稀稠以糊汤能裹住面条为准,若能用大铁锅煮熬,就再好不过了。吃糊汤面少不了油泼辣子和家乡人自制的浆水,油要旺,辣子要稀,调进饭里口舌生津。做糊汤面的浆水不能太新也不能太老,新制作的浆水酸劲不够,太老的浆水又有陈根,不新鲜。

招待客人,贾平凹往往也是因自己的喜好而定,素多荤少,有时干脆没有荤菜。

大凡老家来人,他招待的吃食依旧是糊汤面。因为这一爱好,贾平凹落了个“吝啬鬼”的绰号,但他全然不管这些,还笑嘻嘻地对人讲:“吃这些东西养人。”

说贾平凹吝啬,那是冤枉他了。一次,家乡为修建“贾平凹文学艺术展览馆”,派我们一行专程去西安向他讨要墨宝,当听了来意后,他憨憨一笑说:“老人家来人要我写字,我咋能收钱呢?说说啥内容,要多少写多少!”之后,他又话锋一转:“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我吃一顿糊汤面,咋样?”听他这么一说,我们连连点头,便跟他去不远处一家饭馆吃糊汤面。饭刚端上桌,他就自顾低头大口吃了起来,也不顾饭没吃完,一会儿要独瓣大蒜。我们一碗还没吃完,他两碗就已下肚,辣得嘴直吸溜,头上直冒热汗,他也不用餐纸,光手一抹,就又埋头吃起来。他的吃相不由使人想起“酣畅淋漓”一词来。说好是我们请客的,饭后他却抢先付了饭钱,说:“糊汤面不值钱么!”

返回途中,与他交谈讨教,他借用了在四川乐山大佛留下的一副对联作答:“乐山有佛,你谒拜,他拜;苦海无边,我不渡,谁渡。”

(作者单位:陕西省丹凤县委党校)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